

造就专门人才——国学研究院的教学

► 金富军

1925年，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。根据1925年4月公布《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暂行章程》和1926年4月15日制定《清华学校组织大纲》，清华学校分大学部与留美预备部两部。大学部分为本科和大学院，大学院未成立之前暂设研究院。

研究院下分普通科、专门科与研究院。“研究院系为研究高深学术而设。先设国学一科，以后按照需要及经费情形添设他科。”“至民国十九年大学院成立后，研究院即行停办”。可见，研究院设立是大学院设立之前的权宜之计。由于其他科并未添设，研究院以国学一科贯其始终。因此，习惯上又称研究院为国学研究院。同时，研究院的人事、经费、教学等相对独立。从而，研究院实质上从大学部独立出来，成为与大学部、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。也因为研究院是大学院成立之前的“暂设”机构。因此，1929年，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，国学研究院即行裁撤。

研究院创立缘起

清华建校起，清华师生从自身特点出发，发出调和中心文化的声音。“新中国学者之责任在镕中外文明于一炉，集古今学识于大成。若抛却祖国优秀之文化而不问，专急急于欧美之文字与习尚，离本学之本旨远，为欧美造人才也。……清华学生当以前宜，先固其国学之根基，将数千年礼教风俗洞悉于胸中，则出洋以后可将教风俗与欧美之礼教风俗相比较，参酌情形，审度时势，取彼之长补我之短者，此出洋者助彼所无者，以造就一种新文明而坚固亚东新国家……”存在于师生中的这种文化观体现出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态度。

1923年2月11日，梁启超于天津对来访的清华学生谈清华学生的使命，谈及在学习西方的同时，指出美国的“教育过于机械的实利主义太深了”，“因为实利主义太深，所以时刻的剖析异常精细，如此好处自然是有的。”但“这种实利主义的又一结果就是将人做成一部分的人。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的，他固然有混混沌沌的毛病，然而只做一部分的人，未免辜负上帝赐给我们所人人应享的‘一个人’的生活了。”梁启超指出：“我以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，应当融和东西文化，不要只代一面做宣传者。”

曹云祥校长认为，中西文化经历了两次大的融合。汉代佛教东传为第一次。近代以来，西学东渐为第二次，“是为本国文化与第二种外国文化相接触最亲密之第二界线。而第二种之外来文化，亦如风驰云骤，卷地而来之时也。”在全国“群趋欧化，如醉如狂”的情况下，“吾人今日所汲汲者，不在输入文化，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，如何融和，如何承受，令其有实用于国家。”最适宜的办法，就是成立研究院。“吾所欲设之研究院，即本斯义。无论何种学术，皆须先明其研究之法，然后用之以研究中国问题。凡对于国计民生，有直接关系，或对于世界文化，有间接影响者，皆广集通才，详加研究，特其明白解决。不但国家真得学术之用，即东西两文明之真象，亦可因之而表明。”“中国今日宜设研究院，以为建设最高等学术之基础。”显然，曹云祥跳出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讨论的窠臼，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考虑中西文化如何会通。

曹云祥将国学研究院视为“巩固新大学之根本”。他说：“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，大都抄袭欧



清华艺术博物馆前的国学院四大导师雕塑

美各国之教育，欲谋自动，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，悉心研究。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，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，其研究之法，可以利用科学方法，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。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国魂，犹如日本武士道之魂，新意大利之魂，及各国之国魂。”

由此，1925年成立的国学研究院以“研究高深学术，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。”1925年9月，研究院筹备主任吴宓在研究院开学典礼演说中阐述研究院开办旨趣：“（一）值兹新旧递嬗之际，国人对于西方文化，宜有精深之研究，然后可以采择适当，融化无碍；（二）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（如政治、经济、哲学），须有通彻之了解，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，种种重要问题，方可迎刃而解，措置咸宜；（三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，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，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，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，所学且与国情隔阂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。”简而言之，成立研究院旨在融会中西、贯通古今。

1926年3月，曹云祥校长在学术追求之外，还强调国家精神。“近年教育既日趋欧化，旧有之文化学术，遂日见沦丧。夫国家精神，寄于一国之宗教哲学文词艺术，此而消亡，国何以立。谓宜以西

洋治学之方法，整理之，发扬光大之，则国学研究，不容缓也。本校延名师，设专院，招海内成学之士，讲贯肄习焉者，竟在是也。”

针对当时国内国学研究“紊乱残缺，不绝如线，亟待提倡，以资保存……国内提倡国学之机关甚少，而又办理不善，人才缺乏，或则陈腐，嫌其过旧，或则偏激，强名曰新，或则但务琐屑之考据；或则徒事浮华之辞章。”吴宓提出，国学研究应该树立两个目标：第一，整理全部材料，探求各种制度之沿革，溯其渊源，明其因果，以成历史的综合。第二，探讨其中所含义理，讲明中国先民道德哲理之观念，其对于人生及社会之态度，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，以为比较，而有所阐发，以为中国今日民生群治之标准，而造成一中心之学说，以定国是。如能实现第一个目标，则中国之文明，可以昌明树立于世界；实现第二个目标，则中国对于全世界之迷乱纷争，或可有所贡献。

在此思想指导下，研究院采取了异于国内其他大学的国学研究之道，即“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（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），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。”

从体制和功能看，研究院是一个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机构，即“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”，明确培养两类人才，即“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”和“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”。

研究院“学员研究期限，以一年为率，但遇有研究题目较难，范围较广，而成绩较优者，经教授许可，可续行研究一年或二年。”

研究院兼容并包，学术自由，充分发挥各位教师的特长和主动精神。《研究院章程》明确规定：

“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：研究方法，注重个人自修，教授专任指导。其分组不以学科，而以教授个人为主，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。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，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，均能确有所获。”

研究院教务会议记录

研究院教学方式分为“普通演讲”和“专题研究”。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，每星期至少一小时，所讲为国学根柢之经史小学，或治学方法，或研究心得。普通演讲要求研究院学生均须到场听讲。

专题研究指在教授指导下学生进行课题研究。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提出指导范围，自由划分，不嫌重复，让各生根据自己的志向、兴趣和学力，选择教授作为指导教师，确定研究题目。如题目需要多位教授指导，也可以同时请多位教授指导，以收转益多师之效。题目和导师选择以后，不得更换，以免纷乱。《章程》规定“教授于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，应订定时间，常与接谈，考询成绩，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。”

研究院教师严格按《章程》执教，各位老师指导范围和开设演讲如下：

| 姓名 | 教授指导学科范围 | 普通演讲 |
|-----|---|--------------|
| 王国维 | 经学：书，诗，礼 小学：训诂，古文字学，古韵 上古史 中国文学 | 古史新证 说文练习 |
| 梁启超 | 诸子 中国佛学史 宋元明学术史 清代学术史 中国文学 | 中国通史 |
| 赵元任 | 现代方言学 中国音韵学 普通语言学 | 方音学 普通语言学 |
| 陈寅恪 | 年历学 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 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 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 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| |
| 李济 | 中国人种考 | 人文学 |

部分课程并非只限于研究院学生，征得教授同意后，大学部、留美预备部学生也可以选修。例如梁启超的《中国通史》、赵元任的《普通语言学》等。

梁启超对这种指导方式表示肯定，1926年1月13日，他在致吴宓信中写到：

“以现在半年间成绩而论，实属不坏，也可以说超过我的希望。现在三十人中，我认为可以裁成者，实占三分一以上，其中有三五人，研究成绩，实可以附于著作之林而无愧。其所研究者，固皆专题也，但专题却非由教授指定，我不以我自己所研究者强彼辈，彼辈所欲研究者我若绝对不能指导则谢之，若相对的可以指导，则勉强为之帮助，我以为若循此办法办下去，明年招考稍加严，则成绩必更优于今年，前途发展，未可限量。”

研究院的课程，兼具广博与精深。研究院讲授内容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学的范围。事实上王国维、陈寅恪的学问途径，与西方汉学的方法多有一致之处，原本就是国外汉学界看重的中国学者。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，也属于现代语言学的范畴。李济的民族学和考古学，更直接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。

王国维之子王登明回忆：“他主讲的几门课程如说文、尚书、古史新证等课的研究生，学后都说受益匪浅。特别是《古史新证》是父亲改订《殷先公先王考》《续考》《三代地理小记》《殷周制度论》等论文而成，传授了他的治学与研究方法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。他还直接指导许多研究生进行专题研究。受他专业指导及受到他的熏陶而成才的，不下数十人，后来大都成为古文字学、史学、考古学诸方面有高深造诣的人才。”

研究院导师指导学生重在启发，主要在养成读书习惯和学得研究方法。1925年底，梁启超曾对研究院学生作“我为什么来研究院当教授”演讲，表示：“（一）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，（二）指导做学问的良好方法。我对于研究院事业有兴味，对于本院前途有希望者，即在此。”

研究院学生从游名师

各位教师经历、治学各有特点，师生之间朝夕相处之中，学生获得老师言传身教。

韵学》，（介绍高本汉的学说），陈寅恪先生讲授佛教学。他们除讲课外，其余时间都在办公室等候学生询问。学生上什么课可以自由选择，上课时间也可以不去听课，有问题则可以随时请教老师。学制也是灵活的，一般一年，读完一年不走，念两年三年也可以。

学生根据自己的志向、兴趣和学力，选择教授作为指导教师，确定研究题目。研究院老师在教学中也很注意学生特点，因材施教。学生从游诸位名师，耳濡目染，深获不言之教，为人为学大有进益。

王力回忆：

自从进入国学研究院之后，我就热爱语言学了。喜欢赵元任先生讲的学问。如果说发现十四箱书。是我治学的第一个转折点，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学问。那么研究院的这一年是我治学的第二个转折点，有了名师的指点，我懂得了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学问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：一是王国维先生的治学。他在讲授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时有很多好的见解，但有的地方，他说自己不懂，就隔过去不讲。这样的知名学者，能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这种做学问的态度，给了我极深的教育。……研究院的四位先生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陈寅恪先生博闻强记，真是惊人，他念过的书简直是永远不会忘记。他还懂十几种外语，那时他年岁不大，许多外国学者都拜他为师。我虽然在研究院只学习一年，这一年是永远难忘的。

王力的《中国古语法》由梁启超、赵元任共同指导。梁启超给以很高的评价，认为“精思妙悟，为斯学辟一新涂径。第三、四、五章一下，必更可观，亟思快睹。”“所论二特性真足开拓千古，推到一时。”“通极”等评语。赵元任则相反，对论文不给一句褒语，专挑论文的毛病。“求真、致用两事万不可混。”其中最严厉的一句批评是“未熟通某文，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。言有易，言无难！”后来王

力把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。

姜亮夫回忆：

我本想作个“诗人”，就把四川时所写的四百多首诗词，拿出来请教王先生同梁任公。他们都认为我不适宜于文艺创作，主要是“理障”而无才华。这与林先生意见全同。我回到寝室，一根火柴把这小集子烧了。诗人之梦幻灭，这是我治学道中的一个关键性转变。我遂从王先生指导以“诗骚联绵字考”一书得卒業。

清华园的先生们确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，他们不仅给学生以广博的知识、高深的学问，而且教会学生做学问的方法。根据不同学生特点指明研究的方向，最后让你自己独立研究。这种教书育人的方法使我终身难忘。即使在日常生活中，先生们的一言一语、一举一动也都深深地感染学生，即使在谈笑中，也与学术关联，也给学生以深刻影响。

在优良学风的熏陶和名师言传身教下，研究院学生学业猛进快速成长。研究院出版《国学论丛》，到1929年3月共出版二卷六期，除教师著作，凡学生之研究成绩，经教授会同审查，认为有价值者及课外作品之最佳者，均予登载。吴其昌的《宋代之地理史》、周传儒的《中日历代交涉史》、刘盼遂的《说文汉语疏》等均刊布印行。研究院还编辑出版6期《实学月刊》，受到校内外学人的瞩目。其中代表性著作有高亨的《韩非子集解补正》、吴其昌的《三统历简谱》、王镜第的《周官联事考》等。

研究院四年间共收四届，录取74人；除有2人退学和4人病故外，实际完成学业68人。研究院学生中，王力、高亨、吴其昌、姚名达、周传儒、徐中舒、姜亮夫、陆侃如、刘节、刘盼遂、谢国桢、罗根泽、蒋天枢等，日后都成为著名学者，为我国人文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📖